

伦理选择与精神抵抗:1950-1960年代女性作家的家族叙事^①

毕文君

(东华理工大学 中文系,江西 抚州 344000)

摘要:作为1950-1960年代女作家文学创作的主体内容,女性家族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的存在并非简单,尤其是在家族叙事的伦理选择上,这两代女性家族叙事文本具备精神抵抗的意义。

关键词:家族叙事;女性作家;伦理选择;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1-0102-04

Ethical Selection and Spiritual Resistance: On Women Writers' Clan Narrative in 1950s and 1960s

BI Wenjun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zhou, Jiangxi, 344000)

Abstract: As the main writing content of authors who were born in the fifties and sixties last century, the existence of women writers' clan narrative is not a simple literary fact. Particularly in ethical selection, there exists evident spiritual resistance meaning in the clan narrative texts of these writers.

Key words: clan narrative; women writers; ethical selection; spiritual connotation

1950-1960年代作家群,是当代女性家族叙事的最重要创作群体。她们冲破“玫瑰门”里“无字”的悲哀和“长恨”的叹惋,以文学的妙笔生出花一般的绚烂。那些令我们为之动容的家族女性形象系列使当代文学的家族叙事主题展现出个体生命最为蓬勃的芜杂和美好,也使得当代家族记忆的书写达到了某种精神抵抗的意义。如果说“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中,小说从来没有展示过真实的妇女生活的画卷”,^[1]那么当代女作家们在女性家族叙事里则找到了自我的寻根之路,也开启了对伦理内容、写作规范、生命信仰等内容的持续挖掘与不懈探索。

一 关怀伦理学的话语姿态与女性家族叙事的伦理倾向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研究“性别”,并把它扩大为与特定男性文化

观念和女性文化观念相关联的“社会性别”内容。“社会性别”首先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成分,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归纳了“社会性别”的四个因素,即: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概念,比如在宗教、教育、法律和政治中的概念;社会组织和机构形式,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关;主体的认同,意指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对社会性别的认同。^[2]基于此,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伦理学学者提出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体系,以此审视和批判传统伦理学对女性声音的忽略,从而重新书写人类的伦理学史。吉利根、诺丁斯、特朗托、拉迪克,这些对女性主义伦理学作出开拓研究的学者,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来确立其理论视角,并把它视为两性共同的东西,以打破男女两性在道德上的界限,缔造新的男女两性平等互动的伦理体系,这种

^① 收稿日期:2010-09-07

作者简介:毕文君(1979-),女,山东烟台人,东华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长篇小说与女性文学批评研究。

新的女性主义伦理观就是建立在关怀基础上的女性伦理。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这部关怀主义伦理学奠基之作中明确肯定女性在道德上有一种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在于她们更注重关系、关怀和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认为男性伦理就没有关怀,女性伦理就没有公正,但男性伦理在关怀之后维持的依然是所谓的公正和秩序,而在女性关怀伦理中关怀始终建立在公正之上。同时吉利根描述了女性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这种“女性方式”强调“细节的相关情境而不是分离”,强调“特定情况下的判断而不是普遍的原则”,而“女性的关怀视界是优秀的文学阅读所必需的”,^[3]因此女性伦理学家对伦理思考的文化内涵和研究路径与同时期男性伦理学家并不尽同,她们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考察阐明其蕴涵的女性对当代社会变革、历史发展、伦理道德、宗教神学等的思考,发现当代女性精神变化脉络和思想轨迹,将伦理学的生命内涵推至更广,这是以女性独到的生命感悟和伦理关怀为基准去探求世界起源、历史变迁、时代环境的秘密,体现了社会性别视域中的女性关怀伦理。

随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许多研究者都开始在性别研究范畴中考察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中浸润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尽管有研究者意识到“由于将性别引入到家族传承的网络中而构成了新话语”,并肯定这种由于性别的注入所形成的新话语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家族叙事的特点和贡献”,^[4]但并没有进一步考察这种新话语在社会性别视域中对当代女性家族叙事所产生的影响。所谓新话语自然是同社会性别视角相联系的伦理视域,而女性关怀伦理学的理论探讨为具体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照。1950-1960年代的女作家在其家族叙事中所呈现的伦理倾向正是基于关怀的世俗伦理,而非强调绝对等级、森严秩序的男性公正伦理,这无疑是对道德发生论的男性模式的挑战和改写。女作家们通过家族叙事确认女性关怀的伦理自我,文本中的主人公在关怀与被关怀的冲突情境中实现了女性本质的回归和母性本质的升华,体现了女作家的世俗关怀和悲悯情怀,突出了女性关怀生命、关注个体、关心他人的伦理内容与文化视野。在具体作品中女作家们在伦理层面首先试图挣脱男性树立的家族叙事秩序和等级模式,其第一要义是强调血缘的纯度,所谓同宗同族,凡是异乡异族必是男性家族叙事中的他者,即非我族类。在这样的男性等级伦理中君、父、兄居于正位,

而臣、子、弟居于偏位,即使是男性自我也不能不处于血缘纯度所决定的等级安排下,他们其实与女性在家族叙事伦理中处境一样卑微,他/她们从未体会到生命的自由状态及美好和谐的人伦关怀。实际上作为血缘关系的家族伦理是极为可疑的,它带给人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禁锢和对更为宽广生命世界的漠视,更导致人类世界的狂妄自大和无休止的占有索取。而1950-1960年代女作家的家族叙事中,其伦理关照基本不在血缘和等级的意义上纠缠不清,在她们的审美伦理中女性、男性、人类、世界是可以作为一体而共存的。女作家在家族叙事中摒弃了男性家族叙事伦理等级,以更本真的关怀姿态关照每一位家族女性,并借助其代表性文本以文学之笔复活了一个“乌托邦化”的同性世界,尽管这样的复活和再生是以冲突、矛盾甚至伤害的方式出现的,但没有伤害就不可能达到失去关怀后对关怀的渴望,也正是由于此,我们才一再寻找桃花源,想象乌托邦。

二 “乌托邦化”的伦理选择与女性写作伦理规范的调整

“人伦之始并不是一种透明的概念,它从一开始便是为父系社会服务的,是关于历史、文明、文化、先圣、伟绩及社会法则的意识形态性阐释或叙事。”^[5]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家族叙事作品对阶级伦理和叙事伦理的双重强调,可谓将伦理内涵中的伟绩、社会法则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过度阐释,而关乎女性本己的表达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所以才有《青春之歌》这样由女作家写作的对意识形态进行男性化阐释的文本。而80年代“寻根文学”及“新历史小说”则完成了伦理文化层面对历史、先圣、文化等方面的叙事及有限解构,但文化寻根、历史意识、先圣谱系等仍未确立。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批19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在创作上集体成熟,其标志即始于她们的家族叙事作品,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其首部长篇小说,由此开始通往现在所能看到的作家们各自鲜明的写作风格。因此从写作伦理或作家创作中的伦理选择来看,这些女性家族叙事作品的出现是当代文坛最为关键的一次写作伦理规范的调整,她们为以后的女作家提供了一种标志性的女性写作伦理,即关于女性看取历史、文明、文化、先圣、伟绩、社会法则的态度,反映在文本中则是她们独特的关于女性自我的阐释方式。在这个人伦世界里不再是父子关怀、兄弟手足、夫

妻关系,而是强调母女关怀、姐妹情谊、同伴关系,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女性社会性别式覆盖,它表达了女性群体意识及女性个体对集体归属感的寻求。其间“女性”的概念被联系到母女、姐妹、同伴这样的二元区间,并通过血缘与非血缘的联结表达了关怀的本质。关怀占据了女性的整个生命伦理选择,她们终其一生在现实生活里渴求来自他人的理解,更担负起宽容一切的大爱角色,唯有这样的大爱方可构筑女性的乌托邦世界。

首先是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它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下呈现:《无字》里的墨荷、秀春母女,叶莲子、吴为母女,吴为、禅月母女;《英雄无语》中的祖母和每……这些母女关系牵系着她们互为依存的一面,艰难的生活因为有了母亲的关爱呵护和女儿的善解人意变得温润暖人,让以后那些所谓幸福时光得以褪去不真实的色彩,留下一份难以磨损的苦尽甘来的平常心。而虹影《饥饿的女儿》里的母亲和六六、徐小斌《羽蛇》里的若木和羽、虹影《好儿女花》里的母亲和六妹则放大了母女间的隔膜甚至怨恨,女儿背负了出生之过,但经历了赎罪的艰辛挣扎,最终她们宽宥了对方。如果没有什么罪过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去抵销,那么《饥饿的女儿》《羽蛇》《好儿女花》里冲突式的母女关系就不能不是大爱的极致。同样在姐妹、同伴这个关联女性个体的关怀伦理情境中,女作家扩大了姐妹的非血缘意义。其作品里姐妹、同伴可以互相映衬或者说姐妹多了些同伴的非血缘色彩,而同伴则更添了一份血缘的姐妹情谊,也“正是这种同性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支持,使她们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男权的重重压力下获得自救,也不战自败地消解着那些女人们的敌意与憎恨。”^[6]如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中“我”和虹纯净的友谊,虹给了“我”心灵的安慰,那是类似亲人的感觉。蒋韵《栎树的囚徒》中关蓂玉、贺莲东彼此珍视,要以一个相亲相爱的乌托邦世界改写朴园的历史。朴园在小说中直接作为男性家族叙事伦理物象符号存在,在没有关爱只有猜忌陷害的朴园家族里关蓂玉、贺莲东不杂一丝功利的友情与是因为二人同样的孤独处境,还不如说是善良宽厚的天性使她们自然亲近欣赏彼此,更能体会彼此。如果说关蓂玉、贺莲东间的默契是不需经过身心挣扎的天性使然,那么贺莲东、小红间的和解更是女性个体经历灵魂的淘洗后激发的源自内心深处的理解。实际上贺莲东、小红都是“宗教式”的文学人物,都历尽了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式的磨难

和痛苦。只是在贺莲东那里救赎是朴素的世俗生存之道,是与人为善的自尊自爱,而在小红那里则是一种超验的以牺牲自己来救赎他人的宗教体验,因此她们在家族中的相遇以至最后达成的理解更凸显了乌托邦化的同性世界所表征出的精神意义。这种精神意义即是女作家在最初的文学世界里对“人”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追问:涤荡人世间的丑陋,抚平同性间的争斗,渴求关怀所有生命的最初和最终。这个乌托邦化的同性世界容纳了女性作家对女性、男性、人类、世界之间如何达成心灵契合而不必求同之理想情境的世俗关怀。

三 精神抵抗意义上的“寻找母亲”与献祭式的伦理信仰

由伦理选择中对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进入到写作规范层面对女性历史处境的描摹和个体宿命体验的表露,这两代作家女性家族叙事书写的精神抵抗意义已有所凸显,但家族对于女性更有深一层的意味。肉体的死亡和精神的逃离尽管是每个家族女性在大时代里无望的沉落,但在沉落的钝痛中会有一种大悲大悯向她袭来,它没有被历史奔袭中的女性宿命推翻,命运在飘零里的坚持让她们走向自己所依靠的生命信仰。正如作家蒋韵所言:“在这种幻灭的伤痛中,其实有着对生命无穷尽的大爱”。^[7]这种大爱体现了女性家族叙事里,则是由“寻找母亲”而开始的献祭式生命信仰。“我们没有故乡,没有根。我们是一个漂泊的家族,从母亲,到我,到禅月。”张洁在《无字》一开始就借女主人公吴为之口言说了女性生命的无所依傍状态,对女性生命信仰的追寻必因无所依傍开始。王安忆在《纪实和虚构》中说“我是个没有宗教无根的游子”;《栎树的囚徒》的女主人公还是孩子时就预感自己“从那时起,我一直走在奔往异乡的路上,命中注定我是一个将流落他乡的女人”;而对《羽蛇》女主人公羽而言,“或许她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流浪者,一辈子都在寻找家园而却没有家园”。在这两代女作家那里可能没有什么比“无根之感”更让她们体会到写作的精神意义,其家族叙事的女性主人公一生都在抵挡这来自没有家园的梦魇。经历了家族伦理的代际更替,经过了家族历史的变迁消亡,这个家园梦只能在漂泊里炼就。所谓漂泊即是寻求最初的生命本质,具备超验性意味,从而在女性本体意义上与信仰、宗教、神学接通,而女性个体生存的飘零之苦让她们的信仰更趋向永生。在她们看来现实

所供奉的信仰对女性来说永远是不真实的表象,这“纸上的虚构世界”却是她们真正创世的途径,且是可以安放这个信仰的最好地方,如此意义上的写作对其书写者来说不能不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8]她们和作品里的女性主人公一道执着寻找母亲所给予的那份庇佑,在她们的人生信念里“母亲”超出了具象的存在而成为信仰的生命表现形式。

《无字》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我的母亲”;蒋韵《栎树的囚徒》开篇“谨以此作献给我最亲爱的祖母和外婆”;虹影《饥饿的女儿》扉页上亦有“献给母亲”;项小米《英雄无语》扉页也题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挚爱的祖母”。这些表述共有的词语就是“献给”,也正是它敞开了女性家族叙事中寻找母亲的“献祭式生命信仰”。“献给”不再是给予,而是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体验,更为贴近女性的情感认同和信仰形式,这些家族叙事作品的完成让女作家们了悟漂泊的生命最终可以拥有的皈依是什么,这个精神上的母亲已超越了血缘的联系,也跨过了历史的隔阂。虹影以《饥饿的女儿》为自传,献给母亲、童年,更献给自己。她真正撕裂了自己痛苦的身世,当写完这部作品时,其生命恢复平静,获得彻悟,不是遗忘、告别,而是献祭,“寻找女性的上帝就是寻求超越父权制范围和限制的整体生命”。^[9]女性主义神学领域中女性就可以是信仰本身,她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和自己所信赖的那个上帝,这一靠近女性自我的信仰形式是重获丰沛生命力量的根底,最为核心的特点就是寻找母亲之神和寻找女性神灵,即寻找真正的母亲。

1950~1960年代的女作家在家族叙事作品里把“母亲”看作是“唯一的神灵”,通过母系家族世系的建构重新发现女性的生命信仰,以母亲-女人-女儿三位一体的“大地女神”信仰取代圣父-圣子-圣婴三位一体的“男性上帝”。《栎树的囚徒》女主人公之一范苏柳的命运正是因为母亲的突然自杀而彻底沉沦,“母亲的死预示着我不可能再

和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建立真正深刻的关系”,正是从母亲那里她开始了与世界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失去母亲的生命信仰让她一生从此背负绝望和挫败,所以寻找母亲的生命信仰成为女性向世俗不断敞开又不断遭禁闭的过程。《无字》女主人公吴为回到曾经与母亲叶莲子相依为命的“塬”上,后来却明白自己与其说是在寻找母亲,不如说她是在寻找自己上一辈子没有了结的故事。正如张洁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不过是个朝圣的人,走到圣殿,献上圣香,然后转身离去。却不是从来时的路返回原处,而是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家族叙事文本中寻找女性自我的生命信仰和作家献祭式的写作最终达成了统一,这层关于信仰和生命的追寻也构成了当代女性家族叙事最深层意义上的精神抵抗和伦理选择内涵。

参考文献:

- [1]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68.
- [2] 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6.
- [3] Jenefer Robinson. 妇女·伦理与小说[C]//荒林,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 NO. 2.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217.
- [4] 金燕玉.由家而族——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拓展[J].学海,2002(6).
- [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
- [6] 郭剑卿.蒋韵近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其文化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0(6).
- [7] 蒋韵.我们正在失去什么[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 [8] 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6(6).
- [9] 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北京:三联书店,1995:91.

责任编辑:卫 华